

“疯癫”的背后

——从女性主体性探寻的角度看《藻海无边》

陈佳, 孙瑜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寻求女性主体性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 长久以来, 女性的特征总是被父权文化贬低, 西方某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一般被分化为天使和魔女两个极端。为寻找自身的属性的女性被描述为“疯子”形象。本文通过分析《藻海无边》中“疯女人”的形象特征, 探求导致女性“疯癫”的原因, 揭示女性对主体性寻求的重要性。

关键词:女性主体性; 探寻; “疯癫”; 《藻海无边》

中图分类号: I 0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1-0056-05

Behind “Madness”

——A Review on Wide Sargasso Sea in Light of Female Subjectivity

CHEN Jia, SUN Yu

(Northwest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subject of Western Feminism theory is female subjectivity. Given that the female characteristics have always been depreciated by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women in some works of Western literature are always divided into two extreme roles: angel and devil. Many critics describe the women who struggle to find out their own identities as “madness women”. By the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the “madness woman” in Wide Sargasso Sea,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which also makes a necessary explanation to the search for female subjectivity.

Key words: female subjectivities; search; “madness”; Wide Sargasso Sea

女性主体性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概念, 不同的哲学家对主体性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一般来说, 主体性是指人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征。现代哲

学在主体性问题上, 强调人的自主性、自觉性、目的性等特指和主导地位。女性历来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 男人相信他的身体同世界的关系是直接、正常的, 认识是客观的, 而女人的身体则是障碍和禁锢, 处在男性所特有的东西的重压

收稿日期: 2012-11-05

作者简介: 陈佳(1986-), 女, 湖北武汉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之下。终于女性用书写的方式进行反抗,以“疯女人”的形象来对抗男权文化霸权,其中,《藻海无边》就是部典型之作。作者简·里斯生动的塑造了一个原本美丽、善良的女孩在遭受到各方的压迫后,最终走上“疯癫”之路并以死来结束掉这悲惨的一切的故事。正是因为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女性长期被误解,被当作是一种依附。所以对女性主体性的寻求是非常重要的,是女性走上真正解放道路的必由之路。

一、女性主体性的探寻

主体与客体首先是认识论中一对范畴,所谓主体,就是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而客体则是指认识的对象。主体性是指人的本质特征和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而“女性主体性”则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命题,它反对传统的男权主义文化对女性本质特征的歪曲和丑化,主张应由女性自己来界定、言说女性特征,重塑女性作为独立、自主、能动的人的主体性,目的在于肯定女性地位和作用,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

在西方女性主义兴起之前,西方很少有人把女性当作“主体”,更谈不上肯定“女性主体性”。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创世纪》则有一个象征性说法,即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所以,人就是指男性。在男性霸权话语统治下,女性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缺乏自我的主体性。女性主义者反对这种传统的男权主义观点,认为无论在认识领域,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主体不能只是专指男性,女性也是主体;将与男性一同参与社会历史文化创造的女性视为“他者”,忽略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美国女权主义者玛丽·埃尔曼认为,女性与男性在生活经验、所追求的价值和世界观方面会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却被男权文化社会贬低或歪曲了。埃尔曼在《理想妇女》中,还将男性作家所

描述的妇女特征概括为十一种:不定性、被动性、歇斯底里、狭隘性、实用性、纯洁性、物质主义、空想主义、不合理性、顺从性、反抗性(魔女)等;并指出,西方一些文学作品中往往把出现女性描述为“天使”和“魔女”两个极端类型;所谓天使型是被美化了的束缚于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贤妻良母型妇女;而所谓魔女型则对那些敢于挑战于男性权威的自主女性的魔化。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塑造了一种颠覆型“疯女人”形象,她就是《简·爱》中的伯莎·梅森,亦是《藻海无边》(《简·爱》的前篇)中的安托瓦内特。实际上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来英国后的伯莎,一个是来英国前的伯莎,两者合一才是真正的伯莎。《藻海无边》中的安托瓦内特从《简·爱》的被剥夺了说话权利的“疯女人”角色中走出来,同读者倾诉了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受。这种“疯女人”形象的形成就是反抗的利刃,突破了那些从男性文学承袭下来的女性形象,其中也包含了作者自身的焦虑和疯狂,她们洞穿一切、冷静的寻找出路,不再欣喜也不再悲戚,不再憧憬也不再绝望。

二、《藻海无边》中女性主体性的寻求

《藻海无边》是简·里斯花费九年时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著作,《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成为了简·里斯《藻海无边》中的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简·里斯赋予了女主人公全新的生命,在了解了安托瓦内特的成长经历之后,就会了解为何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子会走上“疯癫”之路并最终以死亡来结束悲惨的一切。安托瓦内特用“疯”的形象来表达个体的反抗,它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对“疯癫”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探索,他指出:“疯癫之所以成其为疯癫,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是另一种疯癫——理性疯癫的结果,疯癫的历史其实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历史”^[1]。在他看来,疯癫不只是一种自然的疾病,而是一种

社会疾病,即“理性疯癫”,疯癫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理性疯狂压迫人性反抗的历史,理性疯狂压迫人性反抗的目的在于维护所谓的“理性”秩序。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男权主义理性,只肯定男性的主体性,而否定女性的主体性;女性在一些男权主义者眼里,不过是一个被动的、顺从的、沉默的、没有灵魂、缺乏生命力的玩偶。在这种“理性”疯狂地压迫下,女性只能导致“疯癫”。

安托瓦内特就是典型,她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就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出生。岛上的黑人骂她“白蟑螂”,甚至连她的妈妈也嫌弃她,觉得她是个“会给人带来麻烦的孩子”^[2]。对岛上的英国殖民者来说,英国才是他们的国家,所以当安托瓦内特彻底明白她不会被岛上的人们接受时,她很自然的就视英国为她的家园,同时答应了罗彻斯特的求婚。企图通过与白种人的婚姻找到自身的归宿。在罗彻斯特眼中安托瓦内特“可能是个纯英国血统的克里奥尔人,不过眼睛既不是英国型的,也不是欧洲型的。”是一个退化的英国人。西印度群岛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它毕竟不是罗彻斯特的家园;罗彻斯特对这个小岛充满着畏惧和敌意,也不认同这里的文化环境。安托瓦内特虽是英国人的后裔,但她接受的是克里奥尔文化;这种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文化上的差异使罗彻斯特和安托瓦内特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真正的爱情。罗彻斯特承认:“我并不爱她,我渴望得到她,可那不是爱。我对她没几分温情,她在我心目中是个陌生人,是个思想情感方式与我那套方式不同的陌生人”^[2]。这就是安托瓦内特的婚姻悲剧的文化根源。

对安托瓦内特来说,她的最大悲剧是遭到罗彻斯特的遗弃,导致她最终走向了崩溃。安托瓦内特与罗彻斯特结婚后,度过了一段醉生梦死的蜜月。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声称是安托瓦内特同父异母兄弟的黑人送给罗彻斯特一封告密信,从罗彻斯特接到这封信开始,安托瓦内特与罗彻斯特的关系就急剧恶化。为了获得罗彻斯特的爱,安托瓦内特来到奶妈克里斯托芬的住处,求她施展魔法让罗彻斯特爱她。喝了安托瓦内特偷偷

放进“魔药”的酒后,罗彻斯特不仅没有像安托瓦内特希望的那样,相反,他在安托瓦内特卧室的隔壁与她的女佣做了让她切齿痛恨的事。绝望中的安托瓦内特借酒浇愁,“我恨你跟她做的事犹如我恨你一样深。我恨你,在我死之前我会让你看看我是多么恨你”^[2]。然而,不管她对罗彻斯特恨有多深,她还是被带到了英国。被囚禁的安托瓦内特渴望自由。她想向罗彻斯特求得怜悯。但是,求饶无济于事,禁闭是永无终日的。安托瓦内特最后做了一个梦“我手握着的蜡烛掉到地上,燃起了桌布的一角,大火冲天而起……”^[2]安托瓦内特从梦中醒来后,走进了那条黑暗的通道。里斯讲述了一个安托瓦内特的故事,但把结局留给了读者。

三、“疯癫”与吞没性的压迫

是什么力量把类似与安托瓦内特这样的女性走上了“疯癫”这条悲剧性道路?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许多学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波娃看来,“疯癫”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疾病,而是与我们身临其境的文明息息相关。福柯则认为:“疯癫被确定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语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1]。也就是说,“疯癫”实际上是理性世界对不顺从者、反抗者的一种指称,目的在于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消解他们反抗的力量和影响,从而维理性世界的井然有序。然而,现实的绝望又让那些反叛者不得不以疯癫的方式进行反抗。

“疯狂”并非女性的天性,也不是女性的必然归宿。然而女性不平等的社会角色限制了女性的作为人的自由生长,社会传统扭曲了女性作为女人的生命本真。英国女性主义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用“屋子里的安琪儿”来讽刺将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她指出:“你们也许不知道‘屋子里的安琪儿’意味着什么,我将立刻描述她,她楚楚动人,毫不自私,极富同情心,在高

难度的家庭生活艺术的疆域里出类拔萃。如果吃鸡，她捡鸡肋吃，如果屋子漏风，她站在风口顶着，简言之，她的言行举止表明她从未有自己的意愿和心计，总是百叠回肠地同情别人，温柔地顺从别人，最重要的是，她纯洁。纯洁被视为她的美之所在^[4]。女性主义文学试图摆脱男人所设定的“安琪儿”的形象，就是要用笔“杀死屋子里的安琪儿”，也就是要在作品里拒绝那些符合男性理想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作品里出现了“疯女人”形象就是对被歪曲了女性现象的批判。

在《藻海无边》整部作品中，父权的阴影无时不在，这种文化环境时刻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从安托瓦内特几次改性就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受压抑的状况。原来姓科斯特的安托瓦内特后来随继父姓梅森，再后来改姓丈夫的姓。尽管安托瓦内特多次表示反对，罗彻斯特仍然称她“伯莎”。当安托瓦内特的母亲改嫁梅森后，全家都必须按梅森的意志办事，处于被支配地位。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多次要离开科里布里庄园，目的在于以避开黑人的袭击，但都遭到梅森的拒绝。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不幸在大火中失去儿子后，她痛不欲生却被当作“疯子”关起来。野蛮残酷的禁闭和凌辱使她很快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母亲死后，安托瓦内特进入修道院生活，随后她在继父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安托瓦内特嫁给罗彻斯特后，她的一切财产都归丈夫所有。噩梦这才真正开始，她没想到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在失去一切后，得到的只是更深的厌恶和嫌弃，最后，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了庄园的顶楼上，于是安托瓦内特一步步走向疯狂，最终在熊熊大火中找到了归属。

“如果自我不处于成为它自身的状态中，它就不是它自身；但不是它自身恰恰就是绝望”^[5]。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男权社会以各种方式试图把“自我”从女性自身的意识中驱逐出去，使女性的生命处于被吞没、被毁灭的绝望境遇中，最后走向疯癫。

四、“疯癫”与女性主体性缺失

男权社会的压迫与女性的疯癫有着因果关系，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女性自我主体性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对女性的“自我”的发现和实现上做了许多努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的贬值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因为她的威望不是建立在她本身的积极价值上面，而是建立在男人的弱点上面”^[6]。就像在第一部分所说的，安托瓦内特在失去了亲情、友情后，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里又无法找到自我归属的状况下，只能接受继父安排，将希望投注到来自英国的罗彻斯特身上，但当她发现罗彻斯特其实和那些嘲笑她的白人，憎恨她的黑人一样时，她彻底绝望了，终日被锁在阁楼上的安托瓦内特只能像飞蛾扑火一般结束掉一切的压抑和束缚，用死来得到解脱。按照福柯的说法，疯癫是文明的产物和证明，女性疯癫正是父权文化的产物和证明。随着理性主义带来人的异化，这一积极力量反过来成为扼杀人的主体性工具，使人陷入了主体性丧失的状态，处于压抑焦虑，迷惘虚无的精神中。在女性身份的重新认识过程中，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女性需要面对的三个世界必须引起注意：内心世界、两性世界、男女共同面对的客观世界。如何把握和关照这三个世界，构成女性正确认知自身的基础。尽管在男权压抑下，女性因追求自我实现而走向了疯癫，然而当女性以“疯癫”的方式进行反抗时，也造成了女性自身的悲剧。因而，疯癫既非实现自我的手段，亦非目的，疯癫也不是与生活和解的有效方式。女性也只有自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愿意自己卸下这个枷锁，自我才能得到发展和提高。由此，我们才能正视女性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从而对女性主体性的探寻做出努力。

五、结 论

反抗男权文化的霸权压迫(下转第75页)

异,同时具有对原语和译语文化差异进行调和的能力,并以此确定在翻译过程中对可能导致交际失败的冒犯性话语隐晦或公开表达的程度,采用恰当的委婉语进行翻译,最终达到当这些概念借

助于委婉语隐晦地表达时,听话者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和交际情境体会出隐含意图的效果,使交际活动得以顺利完成。

参 考 文 献

- [1]POUR B.S. A Study of Euphem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J]. Translation Journal, 2010(4).
- [2]何兆熊. 语用学文献选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53.
- [3]BROWN P, LEVINSON S.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02.
- [4]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8:72.
-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87.
- [6]MAO L.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ed and Renewed"[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4(5):23.
- [7]哈特曼,斯托克.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69.
- [8]冯庆华. 文体翻译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47.
- [9]蔡平. 文化翻译的困惑[J]. 外语教学, 2005(6):75-78.
- [10]师琳. 从认知语言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 外语教学, 2011(6).
- [11]刘禾. 跨语际实践[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1-4.
- [12]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8-9.

(上接第59页)和寻求女性主体性一直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两个基本命题。反抗男权文化的霸权压迫是寻求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而寻求女性主体性则是女性恢复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的深层次的要求。女性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实现“自我”,就必须确认、塑造女性的主体性和健全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奠基于女性主体性之上的理论,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完整有效的女性主义理论。女作家徐坤曾指出:“在女性通

过写作而赢得自身独立、并促进人类精神生活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革的今天,拯救女性与‘疯狂’,帮助她们走出‘阁楼’的幽闭投向真正的解放自我,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男性和女性共同要面对的课题^[7]。”我们赞成她的观点,21世纪,妇女解放和两性和谐仍然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没有妇女的完全解放和两性和谐,就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

参 考 文 献

- [1](法)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97-98.
- [2](英)简·里斯. 藻海无边[M]. 陈良延,刘文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95.
- [3]李小江. 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J]. 上海文论,1990(1):15.
- [4](英)玛丽·伊格尔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89.
- [5](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致死的疾病[M]. 张祥龙,王建军,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25.
- [6]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21.
- [7]徐坤. 文学中的“疯狂”女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